

第三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综述 [信息来源:]

[上传时间: 2009-12-24]

关闭窗口

第三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 会综述

张沁悦[1] 严金强[2]

2009年11月7日-8日，第三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在上海财经大学隆重召开。本届年会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国有资产研究中心等6家理事单位联合主办，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承办。来自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的近20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入选论文110多篇，主题包括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回顾与未来展望，政治经济学若干理论问题的发展与创新，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数理政治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会议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新中国经济60年：理论与实践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运用市场经济来发展自己，是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用市场手段，但不能抛弃计划手段，依然需要运用计划手段对经济进行调节。中国人民大学胡钧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注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正确处理计划手段与市场手段之间关系问题。复旦大学石磊认为产品市场只要通过市场化就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带来了市场的乱象，需要政府对公共资源进行配置。

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大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强调改革开放应该注重制度创新的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王中保指出，经济发展中国模式的显著特征是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和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长春税务学院黎贵才、卢荻分析了我国历经的劳动密集的增长模式和资本深化的增长模式两种经济增长模式的优缺点，指出从现实性来考虑，后者比前者更具可行性。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学和学科建设。与会学者回顾了60年来中国经济学及经济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国经济学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同时吸收西方经济学合理成分，创建“中国特色经济学”。清华大学赵准介绍了清华大学中级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设计和教学。其特色是把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一门交叉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跨学科方法，倡导多元包容的政治经济学学科视野。西北大学白永秀、任保平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学教育需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强调本土化、分析方法的定量分析以及学科的综合性和交叉性。上海财经大学马艳指出现代政治经济学创新要准寻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总原则，同时注重新方法论、基本假定、数理方法及应用分析等方面的创新路径。河南大学于金富指出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应当遵从科学性、适应性和综合性等基本原则。

二、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创新与发展

与会学者普遍指出，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实背景的变化而进行发展与创新，以适应新的假定条件。本届年会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开设了数理政治经济学专题，运用数理方法对重新解读并发展了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主张应分清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异同；用生产力多要素论突破二要素与三要素之争，主张生产力的发展有其内在动力；对生产关系三方面与四环节的理解与取舍中的问题进行评论，主张拓宽生产关系的内涵。西南财经大学的程民选认为，完全利他的“大公无私”假设和完全自利的“经济人”假设都是非科学的假设。应借鉴哲学、进化论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结合经济学理论发展史，重构符合现实的关于人的行为倾向的理论假定。中国人民大学方竹兰指出，利己与自治应该是市场主体人格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南开大学的王璐分析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认为经济学研究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在于人的活动和人与人的关系。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为分析线索的马克思经济学正是在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及其统一利润率的古典一般均衡的微观基础之上，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系列宏观经济问题，从而形成一个逻辑一致的总量理论体系。

关于劳动价值论、再生产理论与价值转形问题。上海财经大学鲁品越将社会劳动分为“常规劳动”和创造生产条件的“创新劳动”，“创新劳动”创造价值的时间过程是宏观层次的社会历史时间过程。长春税务学院丁堡骏认为市场价值是与价值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独立范畴，市场价值是价值的转化形式。日本岛根县立大学张忠任用数学方法，通过构建期差性、域差性等概念，说明劳动生产率可与劳动价值量成正比。中国人民大学沈民鸣证明了劳动和劳动力分别是时间的不同形式的函数，劳动是劳动力的函数，二者不在同一空间，并证明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正确性。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指出萨缪尔逊关于两大部类经济的投入产出表示法没有正确反映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并重新推导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的产品构成方程、供求平衡方程、以及投入产出表示法。上海财经大学齐新宇等在经典的马克思再生产模型中加入政府部门，考察政府行为对社会再生产实现条件的影响，以及政府行为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西南财经大学肖磊将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纳入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证明了马克思价值-价格理论的内在一致性。安徽大学荣兆梓、程建华指出萨缪尔森在价值转形问题上的谬误，认为关于固定不变的实物工资向量 m 是产生谬

误的根源。他们推导了转形公式的现代表达式，并论证了马克思转形理论乃至整个劳动价值论在数学逻辑上的完整和精准。上海财经大学马艳、严金强认为价值转形本质上是价值体系到生产价格体系的长期动态的过程，通过建立价值转形的动态模型，考察了动态转形过程中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和社会平均剩余价值率等量的变化对转形结果的影响。

关于国际价值理论与经济全球化。厦门大学陈永志认为科技革命引发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对商品的国际价值产生重要影响，使国际价值呈现出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新特点。中国人民大学齐昊分析了比较优势战略的局限性，认为比较优势理论的乐观结论建立在缺乏根据的假设基础之上，缺少对生产方式特征的考虑。上海财经大学马艳、李真通过构建多变量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模型，得出了一国的技术进步、固定资产投资、教育水平和国际经济制度权利是影响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的主要因素结论，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北京师范大学的白暴力等分析了美元过量发行与贬值导致财富从世界各国向美国转移的机理。

关于经济危机根源理论。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正确认识当前全球经济衰退的成因和根源，既要坚持马克思危机根源理论，又要对其进行发展。现象上的金融危机，实质是实体经济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其根源是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矛盾。此外，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模式是促成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复旦大学的严法善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大量分析仍然是认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把钥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许健康深入阐述了大萧条、大危机和经济长波收缩期三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对长波“第二个拐点”的争论加以阐述分析。上海财经大学何玉长指出，要从经济制度和市场制度两个层面来正确理解当代经济危机。从历史长远趋势和历史规律来理解，经济危机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从马克思对商品经济不同阶段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分析，市场制度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天津师范大学的丁为民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社会生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认为人的本性是由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在阶级社会中，这种生产关系具体表现为阶级结构和阶级冲突，而这种冲突及其与生产力的矛盾才是造成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动充满矛盾并最终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关于危机的其他诱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乐明指出，美国公司治理模式下，高度分散股权结构导致经营者短视行为；失当的薪酬体系“激励”管理层的冒险行为；管理层监督缺失；“股东至上”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员工利益等缺陷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上海财经大学的邱国景与李韵探讨了新媒体通过信息流、商品流、资金流和知识流等途径影响经济危机的机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程启智认为，中国一直存在产能过剩或紧缩的可能。如果经济继续靠投资和出口两个需求拉动，而消费需求不断萎缩，将积累更大的危机隐患。

关于演化经济学与比较经济理论。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演化经济学各流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又存在重要区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杨虎涛指出演化经济学各流派关注的核心命题是：作为“关系实在论”复制的一种能动性与结构性的关系。即在时间的不断流逝和人类活动的不断发生中，社会的人、关系的人不仅需要通过活动保有自身存在，而且要维系原有的关系存在。正是在这种循环往复的能动性与结构的反复作用之中，社会经济体系发生了种种变化。演化经济学各流派都有相似的观点，而这些观点都可以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得到深刻的反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斌认为，演化经济学局限于抓住西方经济学的某

一方面——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范式和过度的数学形式主义——来反对整个体系，从而在科学上，演化经济学并没有比西方主流经济学前进一步。福州大学的周小亮等构建了一个基于个体偏好融合的动态演化模型分析广义的企业利润目标（纯经济利润目标、发展目标、和谐目标和企业社会责任）实现的可能性。认为社会中企业全部追求广义的利润目标是个稳定的演化均衡，制度因素在整个演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的谢富胜和李安沿袭了马克思将分工区分为企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思路，分析了分工动态与市场规模扩展关系。指出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同的不确定性促生了相应的市场结构。清华大学的王程鞅针对“路径依赖”的制度变迁提出了“相互依赖”的制度变迁模式。认为两种模式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的共享观念并不愿与博弈的均衡或规则本身，而是来源于“外部”的流入；参与人的“理性”也是通过认同选择和认同的自我强化机制被后验的建构而成。

三、当代中国经济问题分析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应把握正确的方向，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关于所有制结构与国有企业改革。南京财经大学何干强认为目前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严重下降，正在造成深层次不良问题的发展，应充分认识到其紧迫性，并把握目前的有利时机。南开大学段文斌认为当前依然应当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的取向是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清华大学的吴栋等认为，竞争性国有资产产权关系基本理顺后，其运营方式应该由“资产经营，资本运营”向“资产运营”趋势转变；监管方式将由“资产管理，资本监督”向“资产监督”的趋势转变。

关于收入分配与劳资关系。曲阜师范大学任洲鸿认为，应系统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力资本化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对按劳分配进行理论创新。天津师范大学吕景春指出，在“资本雇佣劳动”的观念下，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其权益往往受到损害。必须确立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树立劳动力产权概念，保障劳动者参与企业利润分享的权利。安徽大学的徐晓红通过检验倒U型曲线在中国的存在性，证明中国劳资关系从趋紧到缓和的趋势已经出现，并发现这一趋势不仅受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还受工资增长速度、全球化程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实证分析说明合理的政策调节可以促进劳资和谐。中国人民大学陈享光认为我国宏观经济领域存在内外不均衡问题，其中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外部不均衡源于内部不均衡，最终根源于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特别是劳动收入过低。

关于三农问题与土地制度。浙江财经学院的周冰等指出，由于村委会行为普遍具有风险偏好和可能损公肥私的特征，必然导致集体所有权接近名存实亡状态的产权虚化。现阶段急于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法律形式意义不大，而应最大限度实现公有制经济内部全体成员共同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给农民选择自己所属集体的权力。首都师范大学的程世勇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资产性地权为主导的土地需求成为地权交易和要素组合模式的新特征。多样化的要素组合模式衍生了土地交易的风险问题，如何在收益和风险之间进行合理的权衡是经济转型中的重要问题。东北财经大学的高磊认为，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试验中体现出来的特权干预、股份化风险、内部流转、抵押困境等制度失衡现象，根源是多重委托代理结构中在农村基层组织“超经济强制”、侵犯农村土地产权而形成的“异化委托代

理怪圈”和农户与农业中介组织之间的“弱化的委托代理行为”。建议政府从土地法、土地交易中心、农业合作组织、农村基层政权职能规范等方面进行制度建设和改进。

[1] 张沁悦（1979-），湖北鄂城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2] 严金强（1983-），浙江衢州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上一篇文章：第二届政治经济学年会入选学生论文：中国制造业利润率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
(李亚平)

版权所有：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电话：010-62511177如有任何意见或问题，请发Email至cape@ruc.edu.cn